



# 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

## Environment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fo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王 爾 敏 (Wang Erh-mi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我是朱雲影老師的入室弟子，五十年前跟朱老師學習史學通論、中國上古史和亞洲各國史三門功課。我的重要繼承是朱老師的史學方法，所以二十年前我開課講授四年史學方法，並撰著《史學方法》一書，序中說明了我的師承系統。史學方法是受兩位老師影響，一是朱雲影老師，一是王德昭老師。這是我的學問根源，今天在此報告，特具意義。

### 壹 ● 歷史研究之傳統與歷代史家風範

以我們共喻的常識，對於中國治史學問的特色與前賢風範，大都已能如數家珍，津津樂道。自無須再加引述，老生常談，易受人非議。然而，我仍要在此總約指出幾個要點，說明我們共相喻知的中國史學之特色。

其一，史官制度，悠久、超然、且嚴正。

其二，歷史著作早已建立撰著之形制與書法，具天下之公信力。

其三，史學在學術領域佔有重要地位，自中古學術分別經史子集四部，史學一門素稱乙部，長期傳承，以迄近代。

其四，史家之超卓眼光與獨到精神，自董狐、南史、司馬遷、班固、杜佑、鄭樵、劉知幾、曾鞏、司馬

光、章學誠以降，其識斷、眼光、書法、義例之發揚堅守，予世人高遠之風範，備受歷世欽仰。

其五，中國自古並未出現史學方法專書。但決非不講究史學方法，至少，《左傳》的「五十凡」即表現了寫史的原則義法。歷代史家亦各自有其一定著史方法，只是無人專著史學方法而已。

其六，中國自古代以迄二十世紀前，雖未創生史學方法之專書，然自中古以降千餘年間亦自創專門討論史學之專著，其中以劉知幾之《史通》，章學誠之《文史通義》，以至近世柳詒徵之《國史要義》等，在在表現史學通論之內涵，為後世史家多所參閱並加以依據。

總觀前軌，中國本身史學開創之規模與輝煌遺產，均足以照耀千古，光芒萬丈，傳承三千年。我個人的評斷與觀點，中國史學的成就，我相信是具有永恆寶貴價值，此係誠實的表現，我對中國歷代史學傳統，充分尊重，予以肯定。相反的，我對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史學界若干學者抓緊科學二字的張惶欺飾，誇誕輕躁，甚為疏遠，不欲與之同流。我所宗仰者，仍然是二十世紀以前歷代史家的風範與志節。

我自崇信敬重所受教的史家師長，永遠服膺。而於當代眾多史家中，固多可以深致追慕效法之前輩，但亦不免選擇性的鄙視一些欺世盜名之流。學界這些混混之輩，無論其如何聲名煊赫，我亦必卑視之。

\* 本文係作者民國 90 年 5 月 26 日於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朱雲影教授逝世六周年紀念學術演講會」上發表之講辭。

## 貳 ● 近代之新方向與風氣

梁啟超所倡之新史學，自是二十世紀新方向，中國歷史研究法自此創生。二千年來有史學而未嘗造出史學方法，有則自梁啟超開始。這正足代表新時代史學的中心主流。

中國史學自夏商周史官起，史官是中國之特色，太史是世傳之職業。中經太史公及歷代史家二千年並未有所謂之史學方法。我們尤須特別注意，此係中國史學獨具之特色，歷代人才依舊輩出，未受方法所限。沒有「史學方法」並非短處，而是特點。如此可見，中國古來只是沒有史學方法專著，而史家未嘗不講究治史方法。

中國有史學方法自梁啟超起，然自梁氏起，只見學者不見大史學家。這也是近代特色。

單就梁氏之後之事實言，自其民國 11 年 1 月之《中國歷史研究法》<sup>1</sup> 後，所謂新史學時代之史學方法書，至今不下有數十種。然既言方法，似乎應是普遍原則，但所有史學方法書彼此並不相同，證明仍是各行其是，並未造出天下一致之通則。

此種方法未見統一之現象，亦非壞事，實正反映學術之自由精神，亦是自然而然之事，不應預期在今日百家爭鳴之世，尚能令史學方法定於一尊，出於一途。再從另一角度言，治史的宗旨在於完成一代參考著述專書，史學方法只是運用研治史料史實的一種應用手段，於史學史自各有主從地位。史學方法固不可缺，但史家應用取捨，各從其方便與偏好，而不可責以必須用如何手段達成其研治著述煌煌史書之成果。古之史家各有方法運用，只是不特別標榜方法，並非毫無方法耳。

把話再說回本題，自從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以來，其所標榜、其所用心，特別強調史學方法之開拓新目標新原則，以此手段建造各類各形各門各系之種種歷史專著。質言之，新史學這一重大開拓，全部以史學方法入

手推動，並以史學方法表現新史學之特色，用以與舊史學作區別。自梁啟超的領先提倡，於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望風響應，形成以史學方法代表這個新史學的顯著特色。於是我們史學界凡討論新史學，必脫不開討論史學方法。<sup>2</sup> 在此可以概括申說，二十世紀「新史學」之重心，是由史學方法來擔當全局的主流，只有以這個特點和傳統史學劃清分野。

梁啟超開創「新史學」之新路，後來風從者眾，直貫二十世紀全程，史家無不看重史學方法，故往往不忘兼做史學方法之探討提示。大體自民國 10 年起繆鳳林、梁啟超各撰《中國歷史研究法》，嗣後史家之兼著史學方法者無慮有數十家。略計有何炳松、劉咸炘、姚永樸、李泰棻、張采田、顧頡剛、錢穆、蔡尚思、蕭一山（史學史）、勞榘（史學史）、李思純（史學史）、牟潤孫（史學史）、魏應麒（史學史）、金毓黻（史學史）、朱希祖、柳詒徵、傅斯年、黎東方、呂思勉、張蔭麟、陸懋德、周培智、張貴永（致遠）——我的業師、李宗侗、姚從吾、楊鴻烈、余鶴清、陳訓慈（史學史）、鄭鶴聲、周一良（史學史）、趙鐵寒（史學史）、朱雲影、王德昭（且為本人之業師）等史學名家。至於與本人同時代之史家其於史學方法、史學史兼作研考討論者則有許冠三、余英時、孫國棟、陸寶千、杜維運、張存武、陶晉生、汪榮祖、王德毅（史學史）、遂耀東（馬列學派史學史）、黃俊傑等。我本人專業近代史，上有師承，除研究專題之外，也任研究生教授並擔任四年史學方法課程，二十五年前撰著《史學方法》一書。我自不免繼踵前賢，在梁啟超開先的史學潮流中盡一點微力。反過來說，我是不自期的置身於新時代、新世紀、新潮流中親身研治史學方法並著書傳世，我固無意高抬身價，也不會輕忽自己的心血貢獻。以當代史學家自任，這也是一個逃避不掉的事實。我在史學界掏盡心力，未嘗偷苟，決無自欺，面對往聖前賢，自能心安理得。

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11 年印。又，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12 年。

2 區志堅，〈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對民國史家及其史學方法的研究概況〉，《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5 期，頁 223-254，臺北，民國 87 年 12 月。

## 參 ●「新史學」內涵之變化

單就新史學這個名號而言，像這樣簡單的口號竟然也是各唱各的調。提倡新史學是繼承梁啟超嗎？其內涵相同嗎？在梁氏之後有周予同總結新史學五十年，把其內涵分出各樣的流派？著著名者分別為疑古派、信古派、釋古派、考古派，又分出考據派與義理派。十年前許冠三又出書《新史學九十年》。（我與許冠三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同事十年，他是飽學之士，有豐富教學經驗，畢生教史學方法。）他也大肆分別流派，而把他自己定為自梁啟超以來總結收場之大家，好像新史學已達至高止境，如此著書立說，信從者尚不知又有幾人？尤有進者，臺灣亦尚有人大肆提倡新史學，像是一個新的流派，自立門戶，旗幟鮮明，究不知誰是新史學的真貨色。至少要先真的打倒許冠三，臺灣這批人纔是正宗繼承。當然他們不會是許冠三的繼承人，如此一來，新史學鬧出了雙胞。有破纔有立，如不願繼承許冠三，就須推翻他的理論與評斷。這還是小局面，我們的新史學界可以統治大陸的史家嗎？領導他們嗎？指教他們嗎？

別忘記大陸馬列科學派史學已大張旗鼓七十年，我們的新史學家如何收編他們。他們願不願接受收編，會不會反噬。他們早已自承是北京大學發展出來的正宗史學，都是我們今日新史學派領導人要面對的問題。史學一門也是天下之公器，誰能把持要造成一個理論一色、聲氣一致的統一局面，恐怕是一種妄想，很難實現。

明顯的事態可見，難題不在周予同的一篇文章，不在許冠三的一本《新史學九十年》，而在大陸上馬列科學派史學家的定調，這是第一道關鍵。請參閱遼耀東教授所著《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sup>3</sup>（我與遼耀東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同事十二年，他富文彩，有才華，文史兼長），中共所宗奉的開山祖師，不是梁啟超，而是李大釗，把新史學也定調為唯物史觀馬列史學。同時把三十年代早期的研究以及後來遠走臺灣的史家一律定為資產階級史學和史學家。至於留在大陸的這類聲名雀噪一

時的史學家則定為非馬列科學派之史家，也爭不到馬列科學派史家的稱號。後再進一步定調，把民國初年以來以至二十世紀八〇年間的史學大師，排出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范文瀾五位，以為二十世紀史學大師的代表。

既經定調之後，新史學的內涵也變得複雜矛盾，並且各吹各的調了。在大陸史學界的馬列史學，成為主流內涵，進一步的第二道關鍵出現，那就是不承認主義，一切目的，旨在對於資本主義史學家進行批判撻伐。在這七十年當中的批判可以說是傻指難計。<sup>4</sup> 我們若要言之有據，當可以列舉時代較近，以七十年來一個下限的年代 1983 年，哲學史家劉建國的批評，來代表最近馬列科學派的觀點。

劉建國言：「用史科學代替歷史學的觀點」是中國資產階級學者一種較普遍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又多是表現在對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先秦諸子百家的著作分析上。近代以來，梁啟超、何炳松、胡適、傅斯年等人，就是把史料學加以誇大，使之代替歷史學的代表。他們片面的誇大史料學的意義，認為只有史料學的考證工作才使歷史成為科學，只有考訂古籍才使中國哲學史成為科學的。它的實質在於否認用馬克思主義理義來探尋歷史、哲學史的規律，而用史料學冒充歷史、哲學史。胡適曾說過，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而他的弟子傅斯年也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達著的史料。」<sup>5</sup> 他還說過，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學便是史料學。這樣，他們不但取消了歷史學和哲學史，而且也歪曲了史料學的科學性。所以，我們必須清除這種唯心主義歷史學的觀點。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哲學史，既不誇大史料學的地位，也不抹殺史料學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史料成為真實可靠的，有價值的東西，使史料學成為一門系統的科學。」<sup>5</sup>

在大陸馬列科學派史學主流下的不承認主義，不但

3 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社，民國 68 年。

4 區志堅，見前揭文。

5 劉建國，《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上冊，頁 5-6，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 月。



周予同、許冠三的煌煌巨著全成了被掃除的廢紙，而打著新史學金字招牌的一些人恐怕也難以找到立足之地。我通觀近百年來的史學界，自不免有滄海桑田之感。

我在此鄭重的澄清，我自梁啟超起以至今日是絕對肯定全面的史學發展，但我決無一日一時特別看重學界反覆出現的標語、口號。我不依附也不加入任何門派集團，我可以旁觀認清一切。我有我自己的研究領域，有自己的師承宗風，有自己的開拓方向，未嘗攀附新史學，對其一切宗旨內涵，不贊一詞，更不會著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去向學界介紹。故而對此名詞口號站到不聞不問之列。但我仍必肯定梁啟超的新史學先驅地位。

## 肆 ● 百年來史學界之繁榮增長 多彩多姿

自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重新撰著古代史（如六大政治家）開始展開當代史學發展的起步，直至今日，將有百年之久。於史學內涵、治史宗旨，以至史學方法，均以其新思考定出方向。

就史學內涵而言，重民史而減削帝王世紀之記載。國家主體是人民。

研究重心，淘汰訓世牖民的宗旨，擱置聖經賢傳之傳播，而改以治國利民為重心，以國家之富強定其評斷準則。

方法學講究提出一些原則法則，作為研究歷史必用之手段，如考證、辨偽、註釋。因是而不期然特別重視史料。重史料即重視真實之依據，凡此甚為影響後日科學派史學之建立。包括史料學、科學方法、考據學、辨偽、翻案，皆隨梁氏之提倡而形成史學主流。梁啟超的先路，自是在西方學術衝擊後之先驅反響，且自此順利開展史學之重大發展，一百年來，史學領域一直向外擴張，表現無限空間，令人十分樂觀。史學發展有一日千里之勢，端在此一代學者之信心與努力。適我當此時代，正好接觸不少偉大經師，學到很多，見識增廣。今日之史學內涵開拓甚廣，遠非梁啟超所能預料，亦非三〇年代所謂疑古、考古、釋古、信古等派系所能規範，更少提倡科學派史學，而且此一時代之繁富內涵，可謂多彩多姿，決非科學派史學一個概念所能包羅。想想這些年來（二次大戰後）之史學內涵，可說是五光十色，新題迭出，令人目不暇給，我們的史料一直在大量增

加，我們的研究領域一直在不斷擴張。我們正面臨史學的黃金時代，不過如此多樣豐富，我們可以把梁啟超定為這個時代史學的先驅標竿，卻並不會接受他的有限的領域觀點，也不會完全依賴他的史學方法。至於梁氏以後等而下之的人物，他們無論如何具有野心，也奪不到梁啟超的先驅地位。無論有多少治史學者，也不能不在這一代浪潮中受到淘洗。至於書寫標榜新史學而自命為大師的許冠三自以為總結了新史學，但是恐怕並不能博得史學界的共同承認。其他只靠唱唱口號的人士，更是等而下之，市場的唱貨叫賣聲是一種推銷術，與學問不相干。叫賣聲不斷，市場的繁榮依舊。此是百年來史學界的現象。

我在此陳說百年來之史學繁榮，決不要具體提及甚麼偉大的史書，或何等偉大的史家，須知這種對學人的標榜決不適合在此引說，我所說的史學開拓，無論政治史、文化史、制度史、刑法史、憲政史、官僚制度史、學術史、經濟史、工商業史、都市史、鄉村聚落史、社會生活史、科學史、天文曆算史、農業史、農工技術史、工業史、商業史、財政史、賦稅史、海關史、租界史、中外貿易史、中外關係史、中西交通史、庶民生活史、家族史、民族史、外交史、邊疆史……等等不一而足，俱是梁啟超以後創生而出，無限擴展，不勝枚舉。

## 伍 ● 我的史學方法研治造詣

就史學方法一門學問而言，我自是在朱老師（雲影）、王老師（德昭）兩位領路與教導之下，建立這門知識，表現在我所著的《史學方法》一書之中，可知我是本本分分實事求是，決未嘗大張旗鼓大肆張揚要標榜科學方法或高明智術。

我的史學方法若要向學界提呈自信的見解，可簡約臚陳於後：

其一，我在史學方法中充分認定史學是推理之科學，但並不可附庸於自然科學，亦不可妄想其具相同功能與公式法則。我絕對避免使史學附庸於科學，但凡其他一切附庸科學之人，亦必不是真正科學。我相信史學是獨造精詣，不可附庸於科學之下，比如宗教與文學俱是完全獨立的門類。

我固然充分重視史料，但決不信從三〇年代的學者



所主張的史學就是史料學，其名不合邏輯，其實不符事實。若果照科學邏輯判斷，史學是大共名，史料學是小類名，是在史學之下的一門類，決不可把史料學和史學混在同一地位，否則自然是不合邏輯。史學之下尚有其他小類，類名必當在大共名之下。我也完全不相信靠史料自己說話。我的信念是一切史料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史家的覺識，因史家之需要方使史料有一定之價值，史家是史料的正式主人，是運用史料的專才。因為所有史料自來就未嘗為史家作預備，各有其不同來路不同用途，卻絕對不自承認是史料。只有通過史家的眼光，纔可以當作史料。嚴格說，一切史料皆必須經過史家認定方能成立。反過來說，世上並沒有任何一件史料是為史學上的需要而生成。所以以往史學界的大言自信，種種設論，都是信口雌黃，不能成立。

其二，我深信史學具有重大功用，這是自古以來千古流傳的定說，是即：史學的功用，在於鑑往知來。我已寫在自己的史學方法書中。我崇信古來舊史學的觀點。我已搜輯十種以上論據，在此開給大家。〔見附錄〕當然我是正正派派繼承中國傳統史學，自不會標榜新史學。請參看本文所附的古書中鑑往知來的論據。

其三，我一向主張歷史會重演，當然寫史學方法時，尚不敢大膽作此主張，故未寫入。而二十年前開始在香港講歷史重演，數年前為東吳大學歷史學報寫發刊辭則清楚寫出，在此不重述，我當充分擔負責任。我相信歷史重演。<sup>6</sup>

其四，我主張史學研究的最終宗旨，無論專史、通史，都必須建立一代通識，為世人提示最簡約最明顯的參考知識。我一直不期望歷史家要建立甚麼理論，亦不信任現有的一切史學理論。當然在現今的學術潮流言，我決不反對別的史家努力自創史學理論，因為學術自由，人各有志。

附錄：《史學方法》講義中「鑑往知來」之論據

1. 「夫《易》，彰往而察來。」——《周易·繫辭下》。
2. 「是故子墨子曰：『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墨子·非攻中》。
3.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管子·形勢》。
4. 「以見占隱，以往察來。」——《吳子·圖國》。
5. 「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韓詩外傳》卷五。
6. 「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韓詩外傳》卷五。
7. 「鄭語曰：『不知為史，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韓詩外傳》卷五。
8. 「明鏡者，所以照形；修往古者，所以知今也。」——《韓詩外傳》卷七。
9. 「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大戴禮·保傅》。
10. 「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戰國策·趙策上》。
11.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陸賈《新語·術事》。
12. 「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新語·至德》。
13. 「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賈誼《過秦論》。
14. 「野諺云：前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司馬遷《史記》。
15. 「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劉向《說苑·尊賢》。
16.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說苑·指武》。
17. 「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王符《潛夫論·相列》。
18. 「史書之作，鑑往所以訓今。」——顧炎武《日知錄》卷九。

6 王爾敏，〈東吳大學歷史學報發刊辭〉，《東吳大學歷史學報》臺北，東吳大學，民國 84 年 4 月。